

## 第六章 結論



檢視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台灣文學史，可說是一連串由「禁錮」到「解放」的過程：六〇年代現代主義追求個人解放，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追求社會解放，隨著政治氣氛逐漸鬆綁，八〇年代以降，族群與性別議題等長期被壓迫的聲音也開始釋放出來，意義空間的開放將書寫／解釋權還諸個人，使得台灣文壇呈現繁花盛景的豐富意涵。在眾聲喧嘩的書寫面貌中，原住民文學可說是最為獨特的，它的獨特性不僅來自於其異於漢人的思維邏輯與行文模式，更來自每個作家背後龐大而自成體系的族群文化，孫大川稱之為「山海」的文學世界<sup>293</sup>。「山海文學」所包含的層面廣泛，如對族群文化消逝的追念與感傷、對壓抑與污名的強烈控訴、以及山林河海生活哲學的展現等，不僅豐富了台灣文學的內涵，形成漢人無法模擬的節奏與調性，更為長期以來被迫消音的族群，尋到發言的管道，進而開闢了族群間相互對話的空間。瓦歷斯·諾幹便是八〇年代以降，原住民文學的一枝健筆，他創作的質與量不僅讓人不敢小覷，他筆下的原住民形象，更大大地衝擊了漢人世界。本篇論文以瓦歷斯·諾幹的文本為題材，試圖解析其生命／文學歷程，挖掘其文本的意義與價值。

瓦歷斯·諾幹的文本帶有強烈的去殖民企圖，故本文除了從整體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學環境來探討瓦歷斯與原住民書寫的時空背景外，更主要從「去殖民」的角度審視其運用文字進行的解殖工程。後殖民論述所著重的是解構主體（deconstruct）與重建主體（reconstruct），權力支配的結果使得殖民文化中有許多隱而未顯的壓抑，如政治無意識、歷史無意識等，必須將之挖掘出來，也就是先要解構才能重構。然而除了激情式的吶喊與控訴外，原住民文學必有其文學價值，故本文從四個層面來探討瓦歷斯的文本：主體辨識的過程如何從模糊到顯豁？瓦歷斯如何解構主體？又如何重構主體？以及其文本的藝術展演與文學觀的表述為何。

要探究原住民文學何以遲至八〇年代才有主體自覺的意識，以及何以以控訴、悲情的形象突出於台灣文壇，必須往歷史回溯。原住民的困境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由於原住民各族並無文字，使得歷史解釋權落入殖民者的手裡，從文獻中的原住民如何被書寫，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之眼的凝視，以及原住民長期以來被扭曲、再造的過程，其實充滿著權力運作。綜觀原住民的歷史形象，可以歸納出兩大特點：初次與異文化接觸的漢人，不是將之視為「異己」，就是將之過度美化成桃源仙境，這兩個極端，其實都是對原住民缺乏認

<sup>293</sup>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收錄於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2003.4，頁52。

識所致：「非人化」的人／獸區隔將「他者」置放於與「人」相反的對立面，並用誇大、變形的異域獵奇式書寫，穿鑿附會、危言聳聽，甚至在官方志書中輾轉傳抄，一方面表現出漢人其實無意瞭解原住民，另一方面則固化成論述；「桃源化」則以除魅的程序將異文化納入自我價值體系所能理解的範疇，並合理化漢人的統治。這樣的論述極容易把原住民與天生的野蠻、落後、愚昧、懶惰、酗酒等負面的特質連結起來，因此統治者得以用武力爭討，或施以禮義教化，透過「污名化」他者，使偏見成為知識，也因此合理化了統治階級的權威。日據時期的人類學家開始對台灣原住民進行實地踏查與細部分類，這對認識原住民而言是一大進展，只是當時的人類學報告一方面將原住民納入日帝的監控系統中，一方面又無法脫離將原住民視為「物種」的邏輯，其研究也往往因艱澀而令人卻步，使原住民族成為人類學報告裡的標本模型，也把原住民推向邊緣。由於統治者習於以二元對立的模式解釋世界，而形成漢／原、優／劣、自我／他者截然劃分的堡壘，在統治者所豎立的假想中心裡，原住民無論在文化、經濟、政治、地理層面，一步步都被推向邊緣。早期移民透過暗示、傳說來想像原住民，並不斷複製成原住民論述，而早期人類學家的報告又把原住民擺在櫥窗裡，使得原住民文獻儘管數量龐大，卻與真實原住民的心靈世界相距頗遠，這樣的巨大落差迫使八〇年代的原住民文學家亟欲述說主體。

原住民文學之所以在八〇年代蔚然成風，與原住民復權運動息息相關；而原住民復權運動則連結到台灣島上七〇年代就逐漸開展與深化的一連串「本土化」與「民主化」歷程。原住民復權運動是台灣原住民族主體意識覺醒的代表，也是長期備受壓抑的原住民族對主流社會所發出的第一聲抗議的呼喊，它除了大聲疾呼原住民的邊緣處境以期獲得應有的對等尊重外，更激發出一批原住民文學家，以筆表達原住民的黃昏情境、控訴霸權支配的不公不義，形成鮮明的作品標記。瓦歷斯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原運，卻也受到不少啟發，在原住民文學的抗議與控訴的主題中，與莫那能同為最突出的作家。此外，書寫族群經驗、描摹新舊價值觀衝突、回歸部落母體、以及凸顯原住民女性處境等題材的擴展，都為原住民文學開闢了值得討論的空間。雖然原住民族早在日據時期就能運用文字書寫，然而八〇年代以降的原住民文學，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主要便是著眼於其主體追尋與確立的價值，在此之前，原住民即使能使用文字表述，卻未掙脫被殖民者的意識型態，缺乏主體意識的認知；再者，就文學藝術而論，「原」味書寫的獨特氣質，無論在內容與形式上，都為台灣文壇提供了新養分：原住民獨特的文化背景，開拓了漢人文壇的新視野，其「番語漢化」的語法干擾，更推動著「漢語番化」的可能；此外，解嚴以後的台灣已進入後殖民時代，然而漢人學者往往將台灣被殖民的焦點置放在日帝時期與國民黨極權統治，而忽略

了在台灣的殖民史上，漢人其實也扮演著殖民者的角色，原住民文學提供了我們一個反思的角度，也開啓了族群對話的新空間。

然而主體辨識過程卻得來不易，因為「原住民論述」不僅影響了漢人，更在原住民身上發酵，即便如瓦歷斯·諾幹這等原住民知識份子，也自承自己的原住民意識啓發太晚，我們從標誌瓦歷斯身份的名字，可以看到他自我追尋的歷程：「吳俊傑」代表漢人體制的成功改造，「柳翹」的筆名則充滿中國式的文學想像，而柳翹時期的瓦歷斯，原住民意識已逐漸萌芽，他開始以族群為題材，反抗意味逐漸濃厚；最終，他捨棄了漢人的名姓，回歸泰雅名「瓦歷斯·尤幹」，並在對族群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後，再改為「瓦歷斯·諾幹」。他對名字的取捨，象徵了文化追尋歷程的逐步深刻，這樣的歷程必須「拋掉」長期以來漢人社會體制的價值觀，重新建構主體。由於原住民長期以來所承受的污名，已內化成對自我的自卑自棄，因此，瓦歷斯在自己身上發現原住民與辨識自我的歷程，便有了珍貴無比的價值，也唯有在確立主體之後，瓦歷斯的文學生命才真正開展出來。

去殖民的第一步便是要解構主體。瓦歷斯立足邊緣，從「番人之眼」的角度，為我們展現他的荒野觀點，披露已經進入後殖民的台灣社會，原住民卻依然遭受內部殖民的事實。在其筆下，原住民所承受的內部殖民主要來自國家機器的體制化控制，以及資本主義的無孔不入。國家機器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看待原住民，體制所代表的權力透過不同環節，如政策、教育、語言、法律等，細膩地滲透到人們的無意識世界，讓人們接受宰制而渾然不覺。瓦歷斯的文本從制度、土地、教育、姓名等面向，呈現國家機器加諸於原住民的荒謬性；而資本主義在六〇年代隨著客運車進入部落，也把部落族人帶離部落，永無止盡地分期付款換來的摩登，使得部落傳統價值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戰。資本主義與國家政策的掛勾，名為將荒野帶入文明，實則是粗率而霸道地將原住民各部落推向解體之途。部落的解體可分為內部心靈價值的棄守與外部軀體有形的流亡，傳統價值迅速流失而新價值卻無法確立，迷失在現代化物欲裡的族人，遠離了族群文化的根，成為異化的空心人，在精神世界裡流亡；污名化的效力蔓延在現代族人身上，讓象徵泰雅榮光的黥面變成罪犯的烙印，造成原住民極力想割除族群印記、否定自己的文化，轉而向主流價值尋求認同。此時興起的「部落觀光化」看似為原住民文化帶來一線生機，實則是將原住民文化包裝販賣，不僅無法促進原漢彼此尊重理解，更得不償失的是讓文化商品化，不僅沒有帶來經濟或文化效益，反而形成另一種形式的侵害，連原住民文化的最後尊嚴也得棄守，文化脫離生活，成為被觀看與論斤叫賣的商品。失去歷史、文化與認同的原住民，只有走向肉體流亡的命

運；在瓦歷斯的文本中，原住民對於離鄉背井的滋味並不陌生，然而向外尋求新樂園的結果往往是兩頭落空，受限於學歷經驗與刻板印象，他們往往淪落社會底層做橫向移動，鮮少有機會向上攀升，只能出賣勞力與肉體，以寄生的姿態存在於社會的邊緣，在瓦歷斯的筆下，展開一幅幅原住民流亡圖，也奏起原住民式的浪人悲歌。然而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原住民流亡的事實，會發現那竟是一種「倒著撤退」的弔詭：數百年前外來移民將原住民族往深山裡趕，數百年後，原住民新生代卻由部落往都市移動，然而無論往那個方向撤退，都是逃難的姿態，說明了原住民始終無法安身立命的悲哀。國家體制與資本主義對原住民進行內部殖民，使得原住民無論在心靈或實體上，都處於流亡狀態，透過瓦歷斯的邊緣觀點，我們看到世界大同與民主自由的假象，更發現「文明」原來是那麼「野蠻」。值得注意的是，瓦歷斯的文本往往側重在描述原住民社會的困境與悲情，這樣的角度其實只是原住民社會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它是作者主觀意識的再現，亦即透過對主流霸權的強化，凸顯被殖民的事實，並達到喚醒主體、引起共鳴的目的。

解構二元論述的虛妄之後，去殖民工程最重要的便是要重建主體。在瓦歷斯的文本中，也呈現出強大的逆寫與重構企圖，然而面對長期被遺忘、扭曲、抹黑的族群歷史，要重新建構並不容易，瓦歷斯的第一步，是選擇回歸部落。早年他寫評論、辦刊物，企圖用激昂的文字喚醒更多人對原住民處境的關注，他似乎是成功了，卻也深切感受到在城市中「運動」出來的原住民權益，很難落實在部落族人的土地上，而長年遠離「泰雅」，更讓他驚覺自己的面貌正在消失，因此他呼應國際原住民年的回歸浪潮，於 1994 年定居部落，這一個動作對他的文學生命影響頗大，不僅筆下的泰雅有了實質的面貌，族群養分更成為他創作時的源頭活水，紮根部落實可視為其主體重建的開始。就文學創作而言，回歸部落前，瓦歷斯的文風充滿「番刀出鞘」式的激昂雄健，回歸部落以後，抗議與控訴的部分少了，自足圓滿的力量多了，無論是文學造詣或逆寫方式，都呈現出令人不敢小覷的力道。為了重建族群記憶，瓦歷斯開始進行「挖掘」的工程，向部落族老、歷史文獻、田野土地等追索被消音的人、事、物，藉以填補歷史失憶症與凝聚族群向心力。首先他開始書寫部落故事，包括族人事蹟、土地記憶、生命哲學等，用部落的視角重新詮釋世界。由於故事本身極具有張力與想像力，因而具有諸多可能，意義的開放反而讓文本更豐富；然更為重要的是，瓦歷斯相信，故事的傳承與否關乎族群的存亡絕續，部落記憶具有連結祖先生命智慧、建構主體認知的關鍵意義，沒有故事的族群即將消失，因此，他必須讓故事繼續說下去。相對於故事的隨性創作、輾轉流傳，歷史的重構則是比較嚴肅與困難的區塊，由於歷史記憶長期被壓抑，原住民各族群的歷史彷彿迷霧，文獻記載存有太多變形，故要從遲

暮的族老身上追索，因此瓦歷斯從田野出發，勤跑部落，採錄報導人的口述，從迷霧般的史料與族老的說法裡，重新辨證與釐清族群史的脈絡。在他的努力之下，族人的抗日事蹟、參與大東亞聖戰、以及白色恐怖等史料一一出「口」，並在他筆下連綴成文，〈Mihuo——土地紀事〉、〈Losin·Wadan——殖民、族群與個人〉採用報導文學的紀實手法，書寫部落史與族人傳記；〈Atayal——（爭戰 1896~1930）〉更具有史詩的企圖，在這些功夫的琢磨下，瓦歷斯正致力於書寫族群大河小說，把北勢群的遷徙傳承與時代變化，做跨世代的連結。解構主義對語言符號關係的拆解，將歷史書寫權與解釋權開放，然而對原住民族而言，要書寫自我族群的記憶之前，必須先找回族群記憶。瓦歷斯的挖掘工程與田野踏查，使他的文本具有一種與土地、族群連結的厚度，也讓他的主體重建充滿難以撼動的根柢。

就文學層面而言，瓦歷斯的美學風格首先建立在其「原」味的美學書寫，他把原住民壓抑、黑暗與不堪的現實，用詩化的語言與文學的手法呈現出來，成功地造成迴響、觸動人心。再者，有別於早期作品的激昂控訴，瓦歷斯已逐漸凝鍊出一種冷靜沈潛的筆調，火藥味少了，雋永的文字反而產生更大的搖撼。此外，瓦歷斯也擅長採用黑色幽默的手法進行諷刺，在笑聲背後蘊藏龐大的淒涼，這是作者智慧與觀察力的展現，也是其對殖民體制控訴最深刻與最成功的地方。作者也擅長把族群元素，如神話、傳說、禁忌、價值觀等，做為創作時的養分，形成獨特的泰雅風格，也傳達出異於漢人的生命情調。然而族群元素的介入也無可避免地對閱讀造成干擾，例如拼音族語的意涵、兩個太陽背後口傳故事等，然而作者從有意穿插泰雅元素造成閱讀干擾、到有意不加註解造成理解干擾，所呈現出來的意義正是由邀請非族人的讀者進入泰雅，到把理解文本的功課交還給讀者，主體性的意義更為顯豁。就文類特色而言，瓦歷斯的詩作在素樸主義的理念下，以泰雅質素作為隱喻、象徵的美學手法，營造出「原」氣淋漓的意境。散文則是他最拿手的文類，他的散文具有多樣化的風貌，並兼有詩與小說的特質，而其中最動人的是文字間散發出來的歷史想像力與穿透力，這樣的光澤使他的散文更具深度，也讓歷史的回音透過作者的筆觸，迴響在讀者的心房。小說是瓦歷斯近年來創作的主力，他的題材明顯超越台灣島嶼而向世界延伸，跳脫原住民文學必須書寫原住民世界的框架，開展出個人創作歷程上更為遼闊的生命，也提醒了評論者勿以身份設限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其小說主題偏向沈重嚴肅、殘酷悲痛的現實，並選擇以小人物的喜樂哀愁，構築大歷史的縫隙；以小說的虛構特質，挑戰大敘述「真理」的虛妄。在文學觀方面，貫串他整個文學觀的，依然是去殖民議題：瓦歷斯對於原住民文學的界定，採取「認同論」，亦即以作家的自我認同為依歸，認同原住民族群的文學，便是原住民文學。關於文學史的追溯，與一般以八〇年代為台灣原住民文學興

起的起點不同的是，他認為口傳文學是原住民文學的起點，而書面文學的產生則可以上推至日據時期；對於原住民文學的語言策略，面對台灣文學界「在亦不在」的漠視，瓦歷斯認為唯有以族語創作，才能讓原住民文學保有文化資產，並成為自覺自主的文學活動；然而對照瓦歷斯的文本，這樣的主張卻不無矛盾，瓦歷斯的漢文掌控能力越來越好，而部落母語卻急遽流失，母語創作是否能如願以償，頗值得深思。在原住民文學「位置」的討論上，瓦歷斯認同魏貽君「特區」的說法，並以「自治區」的概念加以強化，只是將原住民文學視為自治區首先便需面臨純粹與雜質的考驗，而自外於台灣文學在全球化的今日也的確有其難度；此外，作者雖然主張原住民文學自治，卻在漢人主辦的文學獎獲獎無數，兩者之間的衝突如何解決？去殖民的理念貫串著瓦歷斯的文學創作與文學觀，然而文學理念與文學創作間的差距卻形成一種緊繃（tension），這將是瓦歷斯必須加以跨越與克服的命題。

魏貽君認為，瓦歷斯身兼「原住民文化論述工作者」、「泰雅族的文學創作者」與「原住民運動草根工作者」的三合一角色，並以此來理解他的詩觀<sup>294</sup>；然而筆者認為，在這三種角色裡，「文學創作者」的身份最為突出，其餘兩者反而扮演輔助的角色。試看瓦歷斯對文類多方嘗試的努力，其作品的質與量更是原住民作家中最突出的，加上近年來其題材已超越原住民議題而擴展到第三世界，打破原住民作家只能書寫原住民世界的框架，更可說明其以文學為志業的企圖心。整體言之，他的文學因社會／主體解放與原住民運動的啟發而以吶喊、控訴之姿，昂揚於台灣文壇；然而如今作者已逐步建構出自己的文學風貌，使得他的文本在作為原運的註腳之後，具有獨立的藝術生命。瓦歷斯·諾幹用文學進行他去殖民的歷程，用文學建構其泰雅靈魂的主體性，更用文學刷亮了祖靈的眼睛、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成功翻轉了漢人的霸權心態，甚至用文學穿透空間與族群的限制，讓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向世界出發。他對創作的堅持不輟、他對多方議題的延伸開展，為我們開拓了更遼闊的視野，也提供我們文學、社會、族群、歷史等多方面的省思空間。

<sup>294</sup> 魏貽君，〈從埋伏坪部落出發——專訪瓦歷斯·尤幹〉，收錄於瓦歷斯·尤幹，《想念族人》附錄，台中市：晨星出版社，2000.11，頁 210。